



怀念阴法鲁先生

杨牧之

收到我的同班同学崔文印郑重送我的《阴法鲁学术论文集》,十分感慨。我从头读到尾,包括“前言”和“编后记”。“前言”是以给《文史知识》写的一篇文章做“代前言”的。我细数“论文集”中共收有五篇阴先生给《文史知识》写的文章。那几年我正主持《文史知识》编辑工作,重读这几篇文章,当年向阴先生组稿的种种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眼前。阴先生有求必应,以他的音乐史研究这份很少有人企及的成果,给刊物平添了许多亮色。《学术论文集》前的几幅照片,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看着照片,仿佛阴先生就在我们面前:阴先生青年英俊,阴先生与师母马恩惠老师的合影,阴先生一家三口的美仑之乐。特别是《学术论文集》最前面的那幅阴先生的肖像照,可能也是先生离今天最近的一幅照片,让我觉得,阴先生即便走了,目光依然专注,嘴唇紧闭的依然不苟言笑。这几张照片,展示了阴先生的一生和阴先生的为人。

我合上书想,如果阴先生生前看到他这部《学术论文集》,他会怎么想,他满意吗?
阴先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37年“七七事变”,他刚读完二年级。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阴先生追随前往。1938年,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阴先生又前往就读。大学本科毕业后,阴先生进入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

据白化文先生考证,阴先生在文科研究所的那一期,人才济济。同时毕业的还有文学部蒋敦义,史学部杨志玖,王明,语学部马学良、周法高,哲学部任继愈等等,都成为一时翘楚。白化文先生说:“成品率达百分之百”。颠沛流离而成才者众,那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业绩,颇令人遐想。
1946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阴先生随学校迁回北平,后辗转北大历史系,科学院史学所,直到1960年又回到北大中文系。

我作为阴先生的学生,阴先生最让我敬佩的是对自己的严格,一生严谨和谦逊;而对别人,始终的热诚、宽厚和栽培。有人说,这种品德是中国标准的为师之道。有标准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近年我常常想,这种为师之道在今天该怎么坚持和发扬呢?
阴先生从大学毕业便开始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一生锲而不舍,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果。我在先生的《学术论文集》附录中,有幸看到先生研究毕业后写的论文《词与唐宋元曲之关系》手稿(影印),蝇头小楷,一百六十余面,字字工整,令人叹服。这篇论文是先生以音乐形式解释文学问题的大胆尝试,也是先生围绕音乐史,进而探讨音乐文化、文化史的开端。接下来,先生又修改1939年写作的《秦汉律初探》,研究成果渐多。但是阴先生写完都不急于拿出来发表,就连五六年前写的文章《先秦礼制初探》,修改后仍要再次刻写蜡纸油印出

来,继续征求专家意见。阴先生刻写蜡纸水平很高,到上个世纪60年代,给我们讲授《史记》、《诗经》专书时,所有辅导材料还是先生自己亲手刻写油印,一笔一划,一丝不苟。这些材料至今我还收藏着。
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和杨荫浏先生合作破解了南宋词人姜白石所存词曲。姜白石留给后人的歌曲旁谱,是留存至今唯一的宋代乐谱,可惜已经没有人能够读懂,也就没有人能够演奏了。这是十分遗憾的。阴先生认为研究破解姜白石创作和记录的音乐作品,可以了解七八百年前宋代乃至唐代的音乐,于是他下决心破译。他充分发挥他的音乐与诗歌结合,音乐史与诗歌史联系的观点,认真掌握地上保存和地下发掘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资料,把对古代音乐的研究做成一个大系统,终于取得突破。他和杨荫浏先生合作,阴先生发扬了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功底,杨先生凭借着对古代音乐的高深造诣,两人珠联璧合,终于完成了《姜白石歌曲研究》,使仅存的宋代曲谱重新悠扬,使今天的人可以听到近千年前的古乐。

但阴先生以他一贯做人的原则,很少谈他的这一贡献。当有的同志谈起这一了不起的成果时,他先说:“近年来许多音乐史家都注意到中国音乐史既不能和诗歌史分离,又是和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把自己放入‘许多’研究者之列的地位。再问他,他便会说那只是“学习前辈研究方法,从事整理运用音乐史料的点滴体会。”
阴先生的研究很注意对国外音乐文化的探索。他的重点是不同国家相同相近的东西,从相互借鉴或吸收中寻找本来面目。比如,现存的相和大曲中有《陌上桑》(即《艳歌罗敷行》),后来发展成乐府《秋胡说》。讲的是秋胡结婚三天便外出谋官。多年后,得官荣归。“睹一妇好,采桑路旁。遂下黄金,诱以逢卿。”采桑女断然拒绝。夸赞自己丈夫多么好。回家后,发现桑园中调戏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丈夫。于是羞愤撞墙,便投河自杀了。

阴先生发现印度拉贾斯坦有一支歌曲,内容与《秋胡行》大同小异,只不过“回到家乡,女子喜出望外地发现那个男人原来就是她那远出归来的丈夫。”
从中看出,两国音乐文化互相影响,而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道德观不同,音乐或诗词也就不一样了。阴先生的探讨是很有意思的。我又想到他考察西藏时的一件收获。
1959年,阴先生还在中科院历史所做副研究员,参加了西藏考察工作。先后四个多月,几乎走遍了西藏所有的寺庙。对于这次考察,同行的考古专家、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教授有过记述。宿白教授说,当地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去哪儿,所以效率很高。在西藏奔波山重水复的萨迦寺,阴先生在狭窄幽暗的藏经殿中,发现了一大批约五百五十余卷汉文经卷。经宿白教授鉴定,这一大批经卷就是《金藏》。白化文先生说:此藏是元宗蒙哥六年(1256年)印造,舍入当时燕京的大宝积寺。不知何时入藏萨迦寺的。它可以补《赵城金藏》之不足。

宿白先生对阴先生说:“你这可是伟大的发现啊。”宿白先生因为高兴而特别地光大其事。确实,如果不是阴先生深入尘封土掩的经卷中去翻看,不是他多年养成的钻研精神,这批经卷可能至今仍沉睡经殿。而后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影印底本《赵城金藏》之不足的《萨迦寺金藏》部分影印补入。可见阴先生发现的重大意义。当访问阴先生的同志问他,您是不是在萨迦寺发现了《金藏》。阴先生很平淡地说:“在萨迦寺看到了一批汉文佛经。”这就是阴先生。
阴先生这种谦逊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上个世纪90年代,阴先生已经七十多岁,商务印书馆要给阴先生出一部论文集。谈了多次,先生终于答应了,把自己的文章再三筛选,反复斟酌,编好送出。但阴先生总担心论文集有什么不妥之处,送出不久,又托人把他的论文集从商务印书馆要回,再加审核。可是,先生身体一年比一年衰老,精力一年不如一年,在他八十七岁去世前,终未能将书稿退回商务。
阴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应中中华书局之请,将遗稿送中华书局出版。责任编辑在翻检编排时,发现阴先生已经做过很多加工。
阴先生不马虎、不急躁,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直到去世都没把稿子交出。这种严于律己、精益求精的精神实在让这些学生敬佩。而《学术论文集》没能能出版之前,也让我们做学生的倍感遗憾。
后来,我已不在中华书局工作。当我拿到此书的责任编辑崔文印送我的《阴法鲁学术论文集》,我内心由衷地感谢他。文印不但实现了我们的愿望,而且把书写得精心、严谨、大方而庄重,实在是代表了阴先生的弟子的心愿,是给先生献上的一瓣心香。



阴法鲁在颐和园

而阴先生对我们,对他的学生、同事却总是满腔热忱,一片忠厚。
阴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不但听过他的《史记》、《诗经》专书课,他还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那时我们三四人集体译注《辛弃疾词选注》,由阴先生指导。白天有课,常常在晚自习时请阴先生来辅导。阴先生不嫌累,晚上总是急匆匆地从家里赶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给我们答疑。有时我们会发现阴先生指甲旁还有滞住的面粉,那肯定是刚忙完家务。我们几个同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内心都不平静。每当这时,我们都会尽快地把不提不可的问题问完,以便让阴先生早点儿回家。
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愈加热闹,“辛词选注”没有搞完,不过,我记着阴先生的嘱咐,办事要有恒心。在文革后期,借“开门办社”的机会,和社科院文学所的胡念貽、陈毓罍等先生合作,搞了一本《辛弃疾词选注》。文革结束之后,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辛弃疾》,由中华书局出版,总算向阴先生交了作业。
阴先生对我的培养我是永生难忘的。
1985年,我在中华书局编《文史知识》。一天,阴先生找我去。他说,他因为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希望我能接着他给学生讲授《诗经研究》专书课。我大吃一惊!这个课是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图书馆系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听完还要考试,考试成绩要记入档案,我哪里有资格给北大三个系的学生教授专书课啊。阴先生说:“你可以,不用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没开过这门课,必须一讲一讲从头条备课讲义;再说,每周讲一次,每次半天,三个多小时,那要准备很多材料啊!何况,我是一个月刊杂志的负责人,设计选题、组织稿件、终审发稿、宣传推广等等,已经够忙了,实在没有勇气接下来。阴先生见我很难,又说:“你讲吧,有问题一起商量。”
望着先生期待的目光,我没有

办法拒绝了。当然,去北大讲课的光荣对自己也是个动力,我接受了阴先生的邀请。
北京大学距我家很远,当时我住在社科院东边建国门内的南牌坊胡同。那时,工资很少,打不起出租车,坐公共汽车,路途遥远,怕身不由己掌控不了时间,耽误上课。所以,每到讲课的那一天,我就骑上自行车,早6点从家出发,一路奔西,7点25分前到北大的教学楼门口,放好自行车,擦把汗,走入教室,7点半正式上课。
阴先生见我往来太辛苦,又去学校申请派车接我。我因为当时还只是副编审,相当于副教授,不够专车接送的资格,在阴先生还有当时教研室副主任严绍■先生的再三要求下,学校同意我打车往返。后来,我当了编审,阴先生、严绍■先生又马上要求学校派车接送。我至今念念不忘。

一天,教研室秘书通知我,下次阴先生要来听你讲课。我脱口而出,我讲得不好,千万别让阴先生来浪费时间。
其实,先生是导师,又是教研室主任,听教师讲课,考核讲授质量,以便改进,乃天经地义之事,但我却不懂规矩,只想了一个方面。阴先生为人笃厚,今天想想,可能他感到了他要听课让我产生的紧张心情,真感到自己做的不对。
不久前,阴先生的学生,现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葛兆光教授,给我寄来他当年听我讲课的笔记,让我颇为感慨,深深怀念培养我、推着我进步的阴法鲁先生。
其实,阴先生除了体谅学生,发现学生的错误还是及时指出的,不过真的是很注意方式,注意时间地点,注意给学生留面子。
严绍■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件往事。1974年,他第一次访日归来,在专业教研室介绍访日情况。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最后结束,出国访问还是挺稀罕的事,所以听讲的人很多。他讲到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宗的总本山。当时严绍■把黄檗(bò)念成黄檗(bì)。第二天,阴先生在路上碰到严绍■,叫住他说:“老严,你说的京都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ào)宗,不叫黄檗(bì)宗。有一种树就叫黄檗(bào)。”阴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学生,这个字要认识。”严绍■脸红了。阴先生便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都记住也难,平时留心就可以了。”严绍■很温暖。阴先生本来昨天当众就可以指出他读错了,但阴先生是顾到严绍■的面子,没有说。严绍■是他的学生,年龄也很大,阴先生仍然考虑得很周到。对比阴先生的严以律己,这种宽厚待人不是更让人感动吗?

如今,当年那个年轻、幽默、业绩丰硕的严绍■先生也已近古稀之年。我们这些比严先生晚两届的阴先生的学生,也都两鬓斑白。大家回忆起阴先生,心里仍然充满温暖,充满感恩。阴先生就像我们的父兄。但是,回顾阴先生的一生,我们也愿意阴先生不要总是那么“谦逊”,您也放开一些,和您的学生说说自己的快乐,说说自己的烦恼,那对您的身体一定有好处。
阴先生我们怀念您。

如果是个故事说明了钟会的机灵古怪,那么下面这个则说明了钟会的辩才和善思。若做深层地分析,钟会知道偷洒“非礼”,还是照做不误,而且被追问时这样狡辩,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也是不对的。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酒。其父发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後,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第二》篇“二钟答父问”)
3、阴险无赖。
上两个故事可以从各个角度解读,而且即便按照最坏的评价,也因此是“未成年人”而受到原谅。而下面这个则直接反映了他阴险无赖的品行。故事简明易懂,如下:
钟会是苟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苟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爽迹,作为母取剑,仍窃去不还。
荀爽是我国古代的音乐大师和绘画大师,与阮籍的关系很好。他为了报复钟会,便在钟会豪宅上画了他父亲的画像。因为太逼真,使钟会触景生情以致无法居住。原著写道:
荀爽知是钟而由无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在画钟门室,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生前。二钟入门,便大感怖,宅遂空矣。(《巧艺第二十一》篇“钟会与荀济北”)
4、睚眦必报。
原文提到的钟会和嵇康交恶,其交恶原因在正史记载不多,在《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第一次见面就不太和谐,也看出两人都是个性极强的人。记载如下:
钟士季精有术理,先不识嵇康,中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榘不辍,傍若无人,时或不交一言。钟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第二十四》篇“钟士季寻嵇康”)
我们不禁再次联想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中原城市群),曾活跃着三个密切相关的知名人物:长篇葛市的钟会、开封市尉氏县的阮籍和焦作市温县的司马昭。更巧合地是,三人都在司马炎 265 年建立晋朝前两年内去世,若再加上此时被杀的嵇康,好像一种历史魔咒,引人感叹。

有关李建成鸩毒事件的种种

倪 冰

《资治通鉴》在讲到隋末唐初的选文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说的是太子李建成鸩毒秦王李世民的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看原文中是如何记载的。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吐,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世民疾。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毒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顾扶还西宫。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吐血数升,淮安王扶掖还宫。帝问疾,因救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宴。””(《资治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七年甲申,第2312页)

大致意思是说兄弟三人一起喝酒,建成了下了毒酒,世民忽然心中暴痛,吐了几大口血,他们的叔叔李神通连忙把他扶回西宫去了。这件事惊动了李渊,李渊不轻不重的说了李建成两句。
此事普遍被考证为贞观群臣作假。原因如下:
1)李渊与李建成矛盾已然激

化到无可收拾,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餐之理?
2)即便聚餐,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
3)更滑稽的是,喝了酒酒又居然不死,难道李世民内功深厚到“吐血数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时糊涂,从黑市上买来了伪劣产品?
4)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是个“吐血数升”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玄武门事变6月4日)
以上文字引自方连辛《史官杰作》一文,但普遍被人接受,似无异议。
然而再让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件事情,就会发现还存在不少疑点。笔者相信李世民喝毒酒后吐血这件事情一定发生过,因为李神通就是见证,并且惊动了李渊,他亲自跑来探问儿子的病,周围太医围了一大堆,这是不可能装假的。我们就来看看认为群臣作假的原因的破绽。
对于方老师给出的第一点,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怎么说也是亲兄弟,虽然两大阵营对立,但是表面上的和气和还是必不可少,的聚餐宴作为应酬,自然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第二点:李渊与李建成、

李建成和鸿门宴相提并论呢?李渊世民在喝酒的时候并不会知道酒里有毒。
对于第三点:笔者闻,人中毒是否会有生命危险跟毒药的性质、剂量有很大关系。如果李世民毒药吃得不多,医治及时,也许问题就不大了。
对于第四点:资治通鉴里面说,鸩毒事件发生在丙辰六月,在突厥寇兰州之后一年,离宣武门之变仅咫尺之遥。新唐书里面鸩毒事件记载发生在突厥寇边之前“俄而突厥寇边,太子承元吉北讨,欲因其兵作乱”。而据资治通鉴记载,离宣武门之变最近的一次是在丙午年“丙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突厥寇兰州”。也就是说鸩毒事件发生在丙午年或者更早,这与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鸩毒时间矛盾。因此第四点也就无法成立。
让我们再来看看鸩毒事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破绽重重的事情,也难怪会引起众人的质疑。
笔者也觉得李建成不大可能会下毒。因为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在东宫喝酒,如果李世民出了意外,那么责任很显然是他来承担。李渊虽然这时对李世民已经不如当初

了,但毕竟“反迹未明”,又是骨肉,若此时真出了这样的事李渊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定会追究李建成责任。而对于李建成来说,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走这一步,除非他已有反心,完全不顾忌李渊,企图解权夺位。但是这个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李建成与李元吉玄武门之变时所处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李渊也无须太子迹象,他有必要这么做吗?
那么,既然鸩毒事件确实存在,而李建成并非主谋,那么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李元吉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不知道的情况下下了毒。多好的一石二鸟之计呀!一来可以威慑李世民的这个眼中钉,二来自己可以不承担责任,因为是在东宫,首先受怀疑的当是李建成,这样可以开罪于李建成。若李世民的死了,那么李元吉就不仅少了一个最有力的对手,另一方面李渊痛心李建成狠毒,有可能考虑重立太子,那么元吉就可以从中牟利。而且要让李世民喝下这杯毒酒也绝非易事,李世民是何等聪明的人,若端酒给他的人脸色稍微有点不自然,那么就很容易被李世民发觉。完全不知情的李建成正好成了李元吉的一枚棋子,因为不知情,

李建成可以从很从容的将毒酒递给李世民,而不使他起任何疑心。从事后李渊的态度来看,也没有责怪李建成,想来他也是觉得李建成不至于蠢到做出这样明显的傻事。而由于没有证据,自然也不能说李元吉什么。而就李世民来说,他则一定会认为这件事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商量好一起干的,而且建成是罪魁祸首,李渊是有意不给他主持公道,偏袒李建成。这件事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玄武门政变吧。
《资治通鉴》中对李建成鸩毒李世民的这件事情的记载可谓跌宕百出。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也参考过新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以司马光看史料的眼力,他必然也产生过疑虑。可他最终还是选择按最有利于李世民的方向记载这段历史,此中必然有种种原因。笔者在这里猜测,这是因为司马光从内心对李世民是极度认可的,从司马光对李世民评价的“巨光曰”中就可以看出。
历史的真相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被改写了,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各种史料的对比记载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从而还原历史中人物物真实的博弈场景,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